

周钧韬 鲁歌 主编

我與金瓶梅

——
海峽兩岸學人自述



成都出版社

周钧韬 鲁歌 主编

我与金瓶梅

——
海峡两岸学人自述

I 207.4
Z 716

成都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

责任编辑：鄢玉兰

封面设计：张光明

版式设计：严晓燕

我与金瓶梅

——海峡两岸学人自述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新80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都江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00千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ISBN7-80575-188-9/Z·28

定价：4.20元

前言

《金瓶梅》属世界名著，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美国学人海托华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这个评价对这两部小说来说，高则高矣，然而亦并不过誉。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属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的这两部小说，其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红楼梦》可谓天之骄子，人间宠儿。自她降生以来，备受人们的青睐，研究者蜂起，研究著作如林。研究《红楼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谓之曰“红学”；研究《红楼梦》之较有成就者，被戴上“红学家”的桂冠。

与《红楼梦》相比，《金瓶梅》则倒霉透顶。虽然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就震惊了当时的文坛，被誉为宇内四大奇书之一。然而好景不长，犹如一个妙龄女郎，在她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时候，就得了个“娼妇”的恶名。当然事出有因，小说中写了不少性行为。在“万恶淫为首”的国度里，她活该倒霉，长期经受着火的批判（禁毁）。人们以读《金瓶梅》为耻，更何谈研究哉。数百年来，研究者与研究论著均寥寥无几，《金瓶梅》依然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然而，这种情况又恰恰给今天的研究者造成一个极好的机

HAB 77/12

遇，他们可以在这块处女地上，尽情地舒展自己的学识、智慧和才能，创造令人刮目的成就。

历史在前进，时代不同了，人们换了一副眼光来认识《金瓶梅》，发现它竟是一座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去研究它，均能满载而归。于是，《金瓶梅》研究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犹如钱塘江大潮一般迅速掀起，迅猛异常地展开。在最近的十几年间约出版了三十部专著（包括中国台湾、香港），二十部论文资料集，发表的论文约五六百篇。犹如“红学”那样，研究《金瓶梅》的学问已被称为“金学”，出现在新闻报道和文献典籍之中。它终于被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承认而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研究中的一门重要学问。

既然有了“金学”，也就必然有“金学史”。笔者编辑这部海峡两岸学者自述录，即是为编写《当代〈金瓶梅〉研究史》作准备。为本书撰写“自述录”者，均为当代《金瓶梅》研究专家和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工作者。

本书具有三个价值：

一、学术价值。在这些“自述录”中，各位学者大体都写到了自己研究《金瓶梅》的起步、动因、研究历程，概括了自己的主要学术成果和提出的主要论点、成就及其社会影响，因此可以说，全书大体概括了当代四十多年来，我国《金瓶梅》研究的概况、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二、历史价值。由于每篇“自述录”都能忠实于历史，对各自的研究历程和成就，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而绝不带有虚构成分的记录，因此，这是一部珍贵的史料集，对研

究当代（包括台港地区）《金瓶梅》研史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审美价值。各篇“自述录”大体带有纪实文学的风格特征，文章生动、形象、优美，并不忽略细节性描述，如不少文章均写到自己研究《金瓶梅》的甘苦得失，喜怒哀乐，读来兴味盎然。文章的题目亦新颖、别致，各呈风采。故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

在本书中撰写“自述录”的不仅有大陆学者，还有中国台湾学者和香港学者。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台湾省学者的《金瓶梅》研究，起步比大陆早，成就亦很显著。毫无疑问，台港地区的《金瓶梅》研究，当然是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发展，台港地区和大陆的《金瓶梅》研究专家之间的联系亦日益频繁。本书由海峡两岸学者一起撰稿，具体体现了骨肉同胞之间的团结、友谊与合作。但愿本书的出版，能为海峡两岸《金瓶梅》研究事业的继往开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周钧韬

1990年11月11日

目 录

前言.....	(1)
瓶在梅下，金其上乎？.....	(1)
——〔中国台湾〕魏子云自述	
一蓑烟雨任平生.....	(15)
——孙逊自述	
半路出家者说.....	(23)
——陈诏自述	
做不圆的梦.....	(39)
——张远芬自述	
清境苦读 幽蹊别探.....	(52)
——蔡国梁自述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68)
——刘辉自述	
不平而鸣.....	(81)
——黄霖自述	
源潜流细冷泉水 根深蒂固飞来峰.....	(95)
——吴敢自述	
为伊消得人憔悴.....	(108)
——周钧韬自述	
“金学”海洋历险者.....	(126)
——〔香港〕梅节自述	
走上探索之路.....	(144)

——王汝梅自述	
瓶开梅花金归谁·····	(156)
——吴红自述	
走进困惑·····	(171)
——宁宗一自述	
春风拂动中的小草·····	(186)
——郑庆山自述	
最是人间留不住·····	(197)
——卜健自述	
此中甘苦两心知·····	(214)
——鲁歌、马征自述	
原野泥深老亦耕·····	(240)
——傅憎享自述	
读不透的书 探不尽的谜·····	(258)
——蔡敦勇自述	
我是艰难跋涉的跛脚鸭·····	(270)
——周中明自述	
无心插柳·····	(286)
——〔中国台湾〕朱传誉自述	
两易春秋未辞苦 甘为奇书传形神·····	(289)
——孔繁华自述	
万顷纵我一苇如·····	(301)
——陈东有自述	
春日访徐朔方谈《金瓶梅》研究·····	(321)
——张梦华	
后记·····	(326)

瓶在梅下，金其上乎？

——〔中国台湾〕魏子云自述

袁小修说：“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窃以为斯乃表面文章，非书之本意也。若以名论，瓶在梅下，而金其上。若以书之内容观之，则金瓶各有隐喻之义，梅在金瓶中也。试思之。

“你怎的想着要去研究《金瓶梅》呢！”

这是不少朋友向我提出的一句画上惊叹号的问题。

我说朋友们向我提出的此一问题，是画上了“惊叹号”的，自然是我的推想。事实上，朋友们的此一问题，确实是画上惊叹号的。这“惊叹号”中包容些什么想法，我可不能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不过，有两件事，倒是可以在此直说的。

一是老作家苏雪林先生发表在《新生活》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大概距今五六年前，记不清确实年月了），其中有一句话：“魏子云研究《金瓶梅》令人难耐。”（大意如此，手头未留此稿，学生剪寄给我，阅后也就一笑置之）我相信，直到今天，苏雪林先生似乎不曾读过我的有关《金瓶梅》研究的论文。

二是《××日报》的一封读者投书。

这种投书，承蒙编者印寄，却还存在手头。不妨照录于此：

××先生：随函寄上贵报副刊一纸，载有魏子云谈《金瓶梅》语言者，此本系每周随报赠送订户。邮收到后以为不宜舍下少年人阅读，特奉请台处。

《金瓶梅》一书，虽其序言故为开脱，有仁人见之生怜悯，禽心见之生贪欲之说，惟内容实乃“文字春宫”，若非身体老化心如止水，鲜有不因之败行丧志，最低影响也要摇荡心情，有误课业进修。魏某到处为此书拉马牵线，强调其文学价值，为鄙所不齿，久不愿家存其文。愿先生亦多以贵报青年读者为念，是幸！即颂

大安！

一读者九月廿七日

这是我从事《金瓶梅》一书的研究，二十年来在各报章杂志发表论文数百篇，第一次接到的这么一件读者投书。该报的这一副刊，是专刊学术性论文的，我已在这学术性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短文，长者七八千言，分两期刊出，短者四五千言，则一期登完。确有三两篇是讨论有关《金瓶梅》考索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的论述。这些论文，不要说中学生接触不上，就是大学中的文史科学子，也不会对它发生兴趣。除了有关于与这方面有相关的研究生，都不会去接触它。我写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已成书出版十余种，以字数计，已逾二百万言。它们的销路，除《金瓶梅词话注释》及小说《潘金莲》曾经再版。这两部书大陆也印行了，且已再版，销行已过十万册。其他还有十多种，均未再版。可以说连一千册也未售出。何以？因为我的《金瓶梅》研究，是学术性的，是专门性的，凡是不曾涉及这部书的人，纵然读过这部

书，也不曾涉猎这部书有关的历史学识，他纵然是位教授（踏踏实实的教授），也未能透透彻彻地懂得我的那些论文层次。所以我感于这位“一读者”先生的这一投书，只是他个人与我个人之间的一点牙眈不愉而已。

我之所以能全心志地在这本书上钻研了二十年，至今不懈，且日起有功，正因为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四子一女，个个教育成人（都已大学毕业），可以说妻贤子女无不肖。家居一向局促，在台生活的前三十年，一张书桌，全家人共用。我的原版《金瓶梅》，由于要随时翻阅，随手乱放。且不止一种，一部部都光明显著地插在书架上。但据我所知，四子一女只有一个小儿子，曾经在书架上抽出，拿去阅读过。那时他已是大学生。我曾问过他：“你读了《金瓶梅》？”答说读了一点点。再问他怎的不读完？他便回答：“读不懂嘛！”别说只是一位大学生，就拿我来说，已经一字不拉地读了九遍了，有些地方曾不厌其烦地读了廿遍卅遍也不止。有些文句，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还解答不来呢。

这位“一读者”说此书“实乃‘文字春官’”，纵然光是对其那些夸大描写性事的文辞来说，似乎也不是一个具有“大学教授资格”而却无文学修养的人，可以一目看去，就能使他“摇荡心情”的。他说我“魏某到处为此书拉马牵线强调其文学价值”，因此使他“不齿”。不知指的是我写的哪些作品？二十年来的研究，直到今天，还沉浮在“成年年代”与“作者是谁”两大问题上。应编者之约，谈到该书“色情”者，只有两篇，一刊《文讯》第五期，一刊《联合文学》七十七年三月号。两文均已收在《小说金瓶梅》一书中（台北学生书局七十七年二月出版）。读者先生不妨看

看，看看我写的是些什么。

《金瓶梅》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还用得着我魏某去“强调”吗？

二

我第一次接触到《金瓶梅》一书，在抗战期间，一位同事在驻地的一位联保主任（等于今日的区长）家见到这部书，借来看时我顺便读到的。是光连纸石印本。虽经这位同事兴致致地指出了其中几处性描写给我读，而我并未发生什么兴趣。那时，我喜欢的是老舍、张天翼、沈从文等人的小说。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北望云的春天》，再有就是高尔基的《童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罗亭》，史坦培克的《人与鼠》、《月亮下去了》，等等。对于那种线装石印形式的书本，早就厌了。是以直到1966、1967年间，逛台北牯岭街旧书肆，见到了两部那种在抗战期间见到的同样形式的石印本《金瓶梅》两部，引发了我当年失去阅读机会的补偿心理，虽索价每部两百元，却也两部都买了下来，另一部让给了朋友。

由于本子是翻印的，印刷太差，字迹模糊，读了不到十回就失去了继续阅读的兴趣。但却翻翻检检地获知了一个故事的梗概。有一天，读袁中郎（宏道）全集，读到他写给董其昌的信，提到《金瓶梅》，到中央研究院读书，在书名卡上查到有《金瓶梅词话》一部，调出书来一看，虽是缩小的影印本，却也比我手头的石印本清晰多了，尤其是字体，也大得多。把我的本子拿去一对，第一回就不一样，其他各回，差别也很大，词话本有的，我的石印本没有。从这里开始，我去查寻有关《金瓶梅》的资料，渐渐地，我知道了有

关《金瓶梅》的版本种种。于是，去读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竟发现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这段论及《金瓶梅》的话，颇多矛盾。嗣后又读了郭源新（郑振铎）发表于1933年7月《文学》第1期上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益发感于《万历野获编》说的“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时间有问题。鲁迅、吴晗、郑振铎都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话，判定《金瓶梅》初版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我对此一判断，非常怀疑。后来，终于在《苏州府志》以及马仲良（之骏）的《妙玄堂集》，查明了马仲良（之骏）“时榷吴关”的“时”，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间。于是，被大家承认了四十年的“《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之说，便从此不存在了。

此一问题，是鲁迅、吴晗、郑振铎等先贤之误判吗？窃以为不是。实由于《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话，在行文的语意上，有含混的问题。当然，也误在当年这三位前贤都没有去查马仲良“司榷吴关”之“时”。但纵以今日的情况来说，我们虽已有了马仲良“司榷吴关”的正确年月，但也无法与《万历野获编》这段话的“语意”循次印契起来。何况，这段话还有其他问题呢！

起先，我并无意要在《金瓶梅》这部书上立下什么“志向”，只是怀疑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话，一定隐藏着一些什么问题？怀疑沈德符可能与《金瓶梅》的作者，有些什么关系？遂写了一篇《〈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篇文章，也只是指出了许多可疑而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已。

遗憾的是，这篇不算短（约两万言）的文章，一在《联

合报》副刊登了四天，除了老友高阳读后写了一封短简给我，指正了我怀疑沈德符是《金瓶梅》作者的不可能外，其他问题迄无反响。那篇文章，并没有去追寻马仲良的“司榷吴关”之“时”。当我查到了马仲良的“司榷吴关”之“时”，肯定了《金瓶梅》不可能在万历四十一、二年(1613—1614)之间有刻本问世，遂益发地有兴趣来坚定信心，要去探索其他问题。就这样，我的《金瓶梅》研究，不得不继续下去了。

三

从事《金瓶梅》这部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作者是谁”的问题，几乎是从事《金瓶梅》研究者，人人都在追寻的两个问题。但基于各人的观点不同，理念有异，以及学识之别，再加上各人的秉赋也有差距，因而立说的基心与作成的立论，遂也纷然杂陈而五花八门，俨然战国游士的百家争鸣，各有主张。被推想出的《金瓶梅》作者，可能要超出三十名了罢？

总结起来，论“成书年代”，也不过嘉靖、万历二说（近始有隆庆之说），论“作者是谁”，也不过南人、北人二说。照目前的情势看来，成书万历说与作者南人说，在理论上已逐渐肯定起来。俗云：“真理愈辩愈明。”这话应是从实验的哲理上得出来的。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上追寻，大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这话来作比况，好在一开始迈步，我就没有把方向弄错。一开始，我就从语言上，否定了郑振铎判定的作者必是山东人的说法（参阅拙作《〈金瓶梅〉探原》页17—34《〈金瓶梅〉的作者》一文）。又从“兰陵笑笑生”的

“兰陵”地名与荀子的“兰陵令”问题，推演到此一“兰陵”一词，可能是附贴荀卿的“性恶论”（参阅拙作《〈金瓶梅〉探原》页161—170《论兰陵笑笑生》一文）。我认为《金瓶梅》的语言驳杂，主要的语言是“官话”（北方语言），却杂有不少的吴语、越语以及燕语，推想这位作者是一位“南人北宦”，既未忘南方人的母语，又熟知北方官话与燕语的人。指摘郑振铎说《金瓶梅》是用山东土白写的这一说词的不合理则。山东一百余县，不要说鲁东鲁西、鲁南鲁北，语言的差异特大，就一县一城的城内城外，也有东西南北的不同语言，怎能以“山东土白”四字来概称《金瓶梅》的语言？近十余年来，研究《金瓶梅》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语言学家也加入了。张惠英先生的几篇讨论《金瓶梅》语言的文章，对于此一问题，最为着力。如《〈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国语文》1985年4期）、《〈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中国语文》1986年3期）、《〈金瓶梅〉中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语文研究》1986年3期）。已把《金瓶梅》有关吴语、越语的辞汇，列出不少例句，加以解说。近又读到《复旦学报》1990年2期周维衍先生的一篇《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更把有关的“杭州话”，列出了更多。且因而认为该书作者是杭州人田艺蘅。

他如陈昌恒、叶桂桐、陈毓黑诸位先生的研究，指出的成书年代与作者，虽与黄霖和我的论点，稍有不同，但成书万历说与作者南人说，则是同一方向的。何以？书中的现实与历史的资料，两相比对，推演不出它是嘉靖间的作品，更推演不出它是北方人的作品。

我是出身于桐城学派的讲求义法、审问神理、以训诂为探索手段的徒众之一，行文立说，首先要追问的是，此一立论有无历史基础；其次要问的是，它有关的社会因素如何？所以，当我们发现到一个问题，获得了创见，打算把这一创见，予以立说来完成结论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了这两件事——历史的基础，与社会的因素。若是考量到你发现到的此一创见，没有历史作你的基础，又无社会因素作你这创见的支柱，请问，我们凭着什么来立说论述？就凭着我们东拾西拣来的那大堆资料吗？

譬如《金瓶梅》成书嘉靖说，就是尚缺历史基础，又失社会因素的一个阶段。按情理，是不能下笔立说的。

虽然，在明朝人论及《金瓶梅》的史料上，有三人说它是嘉靖间人的作品，一是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二是谢肇淛的《小草斋文集》，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托之西门庆者。”三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三则史料，都是闲言语，两者说“相传”，一者说“闻此”，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所以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说：“‘嘉靖间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所以吴晗先生认为类似《野获编》与康熙本《第一奇书》的谢颐序，《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以及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等，“其实一切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应该根据真实的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剔开，还给《金瓶梅》一个原来的面目。”虽然，吴晗

先生的这番话，是针对着那时（距今五十年前）的“作者王世贞说”而发的，可是他的这一番话，仍可用在今天。象上举的屠本峻、谢肇淛、沈德符所说的作者是嘉靖间人的说词，若依据历史基础看来，也可以说那些全是听来的故事，“都不可信”。“应该根据真实的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剔开”，也正是今天从事研究《金瓶梅》者，应去遵守的一个立论基础——历史的记录。

象《金瓶梅》一书，它问世的最早历史记录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发现在这一时间之前有《金瓶梅》一书的记录。更有人说它是嘉靖间“说书人”的底本。试想，象《金瓶梅》这样的小说，若在嘉靖间就在“说书人”口中传说着了，它该是一部多么风行的书。何以社会间的文士，竟无任何人记述它一言片语呢？

再说，象明朝那个淫靡的社会，正德皇帝的荒淫是出了名的，嘉靖、万历的不上朝理事，也是出了名的。由正德到崇祯这百来年的晚明社会，淫书、春画，不干公禁，都市上公开出售性事器物的店铺，也多的是。请问，象这么样的一个淫纵无禁的社会，象《金瓶梅》这样的书，能在文士手中秘密传抄了几十年，竟无人刻印它吗？

这种被称为“决当焚之”的淫书，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问世，居然到了二十年后始有刻本行世，已经是个大大的问题了。还需要再向上推到嘉靖去吗？

我的《金瓶梅》研究，之所以一开始，就死盯着明代人的一件件史料，合并起来一一研制，却又特别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上着眼着力，正因为我出身于桐城学派，学到了桐城学派的治学之道，懂得以历史为考据的基心，以社